中华民族的文化软实力

禾 刀

《中华传统礼制》,汤勤福著,商务印书馆2024年9月出版。

《史记》有载:汉高祖五年,刘邦赢得楚汉之争,统一天下,同时废除了秦朝那套繁琐的礼仪。然而,少了礼仪章法约束,昔日那些并肩作战的功臣开始在朝廷上"酗酒争功,狂呼乱叫,甚至于拔剑击柱,无奇不有",刘邦不胜其烦。后经儒学大家叔孙通制定礼仪规范,朝廷秩序才渐入正轨。

什么是礼?礼到底有什么用?深耕中华礼制历史研究的上海师范大学教授汤勤福,在本书中回到礼成于俗的历史文化源头,分析了传统礼仪类别,以及礼制的特征、演化和变迁,礼仪之邦面临的困境以及中华礼制在多元世界的位置,还探讨了传统礼制进行现代性转化的必要性和途径。字里行间,干货满满,读来有醍醐灌顶之感。

《论语》有云:不学礼,无以立。俗话讲,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汤勤福认为:"礼最初不是制度,而是人类的一种原始习俗(或称习惯)。这种原初习俗广泛地存在于世界各民族之中。"也就是说,礼是伴随着各民族发展而发展的。最初的礼可能只是来自于人们的某种习惯,久而久之,成为一种不约而同的公俗。今天人们习以为常的握手礼,据传只是双方为了表示手中没有暗藏武器。需要指出的是,礼是人们在生活中形成的习俗,先于"制",并无等级之分。只是统治阶级需要,一些礼俗于是上升为制度。一旦这种礼俗升级为礼制,那么就出现了等级观念。这点其实不难理解,同样以握手为例,在今天的日常生活中,领导可以自由选择和谁握手,而作为下级,如果主动去和领导握手往往显得有些草率,谁尊谁卑,一目了然。

汤勤福将中华传统礼制发展从时间维度划分为先秦、魏晋南北朝、唐宋以及元明清四个阶段。先秦时期是中华传统礼制形成的初级阶段。当没有阶级之分的礼俗被统治阶级利用后,往往会上升为统治手段。为强化统治,一些帝王还会脑洞大开地创造一些所谓的礼制,其目的无非是寻找"皇权天授"或"君权神授"的所谓自然法则。西汉王莽篡位后就曾创立"祭天的南郊礼仪",本质上就是"尊君抑臣、伸张皇权",不过他的这一创举因未能得到尊儒大臣的支持而告败。

毫无疑问,儒家思想在中华传统礼制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但千百年来,中华礼制的血脉中早就不再是纯粹的儒家思想。汤勤福认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传统礼制受到各民族特别是北方民族文化的影响,这种影响往往是相互的,汤勤福称之为"礼制的开放性"。以北魏孝文帝为例,他力主"大量采纳汉式礼仪,加速了北魏的民族融合步伐"。而视儒家思想为圭臬的唐宋时代,对外族特别是北方民族的礼仪并没有一拒了之,反倒"主动吸收外族礼仪,形成体大思精的礼制体系"。某种意义上,正是因为力举包容吸纳,所以唐宋文化迅速走向繁荣,步入巅峰,甚至成为邻国仿效的榜样。

相比之下,问鼎中原后的元代在传承中华礼制方面树立了负面形象。元代对汉族礼仪抱有强烈的抵触情绪,其结果自然是很难融为一体。同是北方民族南下,清廷对汉代礼制则选择边吸收边改造。当然,清朝在礼制方面仍旧显得过于僵化陈腐,其一再强调的跪拜之礼,后来在1793年马戛尔尼率英国使团访华时成为外交争议点。古今中外,因为外交礼仪引发的争端屡见不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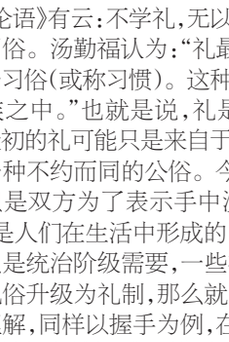
如前所述,礼既然有礼制,自然也有非制之礼,即礼俗。礼俗虽然不是制度,但在规范社会公德秩序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汉书·艺文志》中载,孔子曾云:礼失求诸野。自古以来,上行下效,上层机构力推的礼制往往为中下层乃至民间积极效仿。汤勤福指出:"唐宋既是中华传统礼制专制主义思想的高峰,同时又将礼制向基层百姓扩散,这被学者称为'礼仪下移'。"

汤勤福对"礼仪下移"现象倾注较多笔墨,这是因为,"礼仪下移"往往成为"礼失求诸野"的重要历史源头。"礼仪下移"现象中,除了日常的上行下效影响外,一些士大夫还会私下撰写礼书,有的礼书是"对儒家礼学经典的注疏、答问,供其他人参阅",有的则是"为下层士大夫或庶民编写的礼书,这就是书仪、家礼之类通俗礼书"。"这种涉及千家万户日常生活,强调从俗行用的私家礼书,即便缺少文化知识的下层庶民百姓,稍加解释也可理解并接受。因此,私家礼书在将礼仪向广大民庶传播上作出了贡献,普及了日常礼仪,使这些礼仪深深植入民庶之中"。"礼仪下移"现象"并不是要违背国家礼仪规范,恰恰相反,它们对国家礼制坚决维护,只是根据社会现实做了某些可以让步的简化权变,以争取广大庶民行用相关礼仪"。总之,"礼仪下移"现象的出现,为礼制传承保存了草根血脉。

回溯历史,中华传统礼仪肇始于农耕文明,随着社会的发展变迁,大浪淘沙,一些糟粕早被淘汰,如遭人唾弃的跪拜之礼,还有饱受诟病的守制之礼。汤勤福指出,中华礼制"不仅仅是一种国家法律、社会规范、道德修养,实际上深深隐藏在礼仪背后的礼义已成为一种凝聚人心、安定社会、被广大的各族民众认可的生活方式与生活态度,是中华先人的生命经验和生存智慧"。换句话说,礼,本质上是中华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象征。今天我们回顾中华礼制的发展历史,实际是在追溯文化软实力凝聚的历史轨迹。

山花烂漫敬亭山

张舟子



《杯中流年:李太白诗传》,李联桥著,浙江文艺出版社2025年12月出版。

《杯中流年:李太白诗传》从开元八年李白在新都县驿栈拜谒苏颋落笔:春天,年轻的李白在一个家仆的引领下走进驿栈。李白的身高、步态、目光和忐忑不安的心情,都一一落在读者的眼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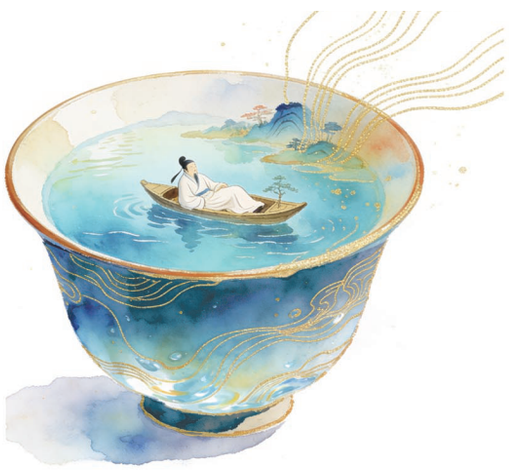
本书从第一句话就给读者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息,读者正在阅读的不是一本学术著作,而是一本有着浓厚文艺气息的李白传。虽然李联桥为撰写这本书已经做了充分的学术准备,这一点,读者可以从书中叙述的李白的生平、交际、大量李白诗歌创作的背景、对李白研究中不同学术观点的辨析中充分感受到,但是李联桥仍然选择了更为文艺化的写作路径。全书以李白诗歌创作为线索,描写李白生平,鉴赏李白诗歌。读罢全书,读者会深深感受到,作者更为关注的显然是李白的浪漫个性与官僚体制之间的矛盾,李白的文学天才与政治理想之间的错位,以及这些矛盾、错位碰撞后四溅的璀璨火花——李白那些脍炙人口的天才诗歌。

书中大量对文学场景的想象与描写,把读者带进李白诗歌创作的具体情景,让读者触摸到李白创作具体作品时内心世界的阴晴变幻。显然,李联桥的写作目的不是探讨某些具体的学术观点,而是想让读者更真切地认识中国文学史上充满传奇色彩的天才诗人李白。我们不妨看看书中关于李白写作《嘲鲁儒》这首诗的介绍。李白居东鲁期间,其狂放不羁的个性在鲁地儒生的眼里简直是伤风败俗,夸夸其谈的做派和现实中的窘迫处境又为当地儒生嘲笑和攻击他提供了口实。儒生们对李白不断的人身攻击终于引爆了李白这座火山,他挥笔写下了这首著名的诗篇。这首漫画化的小诗经过作者幽默地解读,让读者在忍俊不禁之际感受到了诗歌的艺术魅力,认识到李白与传统观念之间的尖锐冲突,还能加深读者对李白个性的感知。可以说,这本书一个很大的价值就在于让读者切身感受到了李白这位中国文学星空最为明亮的巨星内心世界的孤独、寂寞,感受到李白对现实世界的勇敢反抗,给了读者一个有血有肉的诗仙形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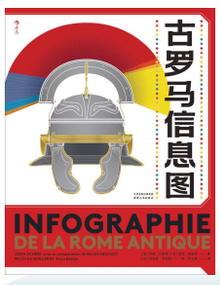
李联桥对李白的同情与理解在为李白的一些辩解中体现得更为明显。王安石对李白的诗歌评价不高,王安石曾批评李白说:"然其识污下,诗词十句九句言妇人、酒耳。"对于这样的批评,李联桥显然不能认同。他为李白辩护说:第一,用妇人与酒说明李白见识污下,其实反映的是王安石对妇人的偏见;第二,李白对妇女的态度充满深切的关切和同情。他以《长干行》为例,指出这首诗"刻画了一个居住在长干里的女子从一个女孩嫁作商人妇后各个阶段的心理,对民间女子命运的悲剧深掬一把同情泪,其细腻真挚的情感堪与白居易的《琵琶行》媲美"。李联桥还进一步认为:"弃妇诗一直是诗歌宝库中最动人心的部分……文人对这一独特社会群体的关注,一方面出于他们的悲悯情怀,另一方面也跟他们的情感体验和命运体验有关。在男权社会中,夫妻之间的关系和君臣之间的关系一样,后者(妻与臣)处于被支配的地位,即便是剖肝沥胆地表明自己的忠心,也时常面临秋扇见捐的命运。在二者相似的悲剧命运中,才华就如女子的美貌,忠贞恰似女子的多情,在昏庸的天子和薄情的男子跟前,它们都可能被无情地抛弃。"这不仅是对这一类女性题材诗歌的深刻解读,也是对李白甚至所有诗人的深刻理解和同情,即使李白于地下,恐怕也会有知己之感。这种对诗人的深刻理解和同情遍布全书,让读者跟随李联桥的笔触越来越深入地理解李白,对于李白那些"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的诗歌,也产生由衷的热爱之情。

《杯中流年:李太白诗传》选择了类似林语堂《苏东坡传》的叙事风格,边叙边议,叙议结合,叙述的是人生日常,亲切有味,议论也多是对具体事件的感喟,很能触动人心。不同于林语堂对传主的仰视,李联桥对李白更多的是平视。李联桥当然敬仰李白的才华,否则,他就不会用二十多万字的笔墨来描绘心目中的诗仙,但是他并不回避李白性格中的缺点甚至是缺陷。"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的文学天才掩盖不住李白政治上的天真幼稚,对这一点李联桥并不讳言,书中对李白在诗歌中自比鲁仲连、谢安、诸葛亮有几分不以为然,对于李白的几次上书直指其逻辑混乱,甚至怀疑李白有点精神分裂。对于李白上书的结果,书中不乏幽默的想象——"看完这封信后裴长史脸上的表情该是怎样哭笑不得",对李白的上书充满了调侃。李白一生,干谒和壮游占据了他太多时间,家中的几位女性为之承担了太多不幸,致使他成了自己笔下造成女性不幸命运的"宕子"。书中对此的批评,是作者站在现代立场穿透李白诗仙的光晕看到的太阳黑子。正是由于李联桥对李白的平视视角,才使他笔下的李白不是一个木偶式的偶像,而是一个才华横溢但又有诸多缺陷的真实的李白。

"众鸟高飞尽,白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一千多年前,李白独坐敬亭山的时候,他大概想不到,一千多年里,他本人和他的诗歌创作,会成为中华文化中一座永恒的敬亭山,陪伴和抚慰无数人的灵魂。春夏秋冬,阴晴雨雪,远近高低,敬亭山千姿百态。《杯中流年:李太白诗传》里那些李白的故事、诗歌,姿态不同,色彩绚烂,带给我们的是一座山花烂漫、生机勃勃的敬亭山,让无数读者沉迷其中,流连忘返。



从城邦到帝国



摘自《古罗马信息图》,【法】约翰·沙伊德、【法】米兰·梅洛科著,【法】尼古拉·吉耶拉绘,天津人民出版社2025年12月出版。

罗马的历史十分漫长。如果算上拜占庭时期,罗马的历史长达两千多年。按照传统的观点,罗马建城于公元前753年,但实际上当地至少从公元前10世纪起就已经出现定居者。罗马帝国于公元476年失去了它的西部领土。但与此同时,在既富庶又易守难攻的说希腊语的地区,帝国却维持了下来,它以君士坦丁堡为首都进行统治,直到1453年该城陷落。

以罗马为首的周边城邦联盟用了几个世纪的时间控制了意大利中部。随后,战争机器进入高速扩张模式。向南,罗马攻占了由令人生畏的萨莫奈人(Samnites)控制的阿布鲁齐(Abruzzi),以及希腊在意大利南部的殖民地。在这一过程中,罗马遭遇了另一个帝国势力——迦太基(Carthago),其势力范围从今天的突尼斯延伸到西班牙海岸,包含了罗马的目标西西里岛和撒丁岛(Sardinia)。这导致了发生在公元前264年至公元前146年之间的三场大战,史称布匿战争,最终,迦太基遭到毁灭。在这些冲突中,罗马时常处于一种刀锋上跳舞般的危险局面,尤其是在面对公元前218年入侵意大利的迦太基名将汉尼拔时。尽管有着强大的军队和极高的军事才华,汉尼拔最终还是被罗马及其同盟的人口潜力拖垮了。正是从这时开始,地中海城市发现罗马几乎是不可战胜的,自公元前5世纪起,罗马已经构建起了强有力的城邦联盟,不管遭受了怎样的损失,都能够在短时间内动员新的军队。一个令人生畏的军事机器就这样出现在了地中海。

罗马当局毫不迟疑地利用了这一点。很快,罗马就占领了西班牙之前由迦太基控制的地区,随后是西西里岛和撒丁岛,最后是迦太基本土。它开始干涉希腊诸城邦的事务,摧毁了马其顿帝国在希腊和小亚细亚的剩余势力,并开始在这一地区持久地扎下根来。公元前1世纪,各处内战和叛乱不断,引发了混乱局面,罗马通过精明地结盟,控制了埃及和小亚细亚内陆诸王国。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在公元1世纪初年,罗马人已知的世界实际上是统一的,罗马帝国已经统治了西至直布罗陀,东至黑海,北至拉芒什海峡(英吉利海峡),南至撒哈拉沙漠或幼发拉底河的广大领土。在公元1世纪,罗马人还征服了今天德国西部、奥地利和罗马尼亚的部分地区及英格兰,一直到苏格兰边境,并于公元2世纪在东南方征服了我们今天所说的阿拉伯地区。

公元120年左右,这个帝国达到了最大的疆域,实现了其权力的自然极限。在北方,罗马人一直无法在莱茵河的另一岸和多瑙河下游实施持续统治,在苏格兰也无法跨出安敦尼长城(Vallum Antonini)。在南方,幼发拉底河始终是不可逾越的界限,即使该河以东的某些王国可能在一段时间内成为罗马的附庸。然而,在这些疆域内,罗马及其同盟(socii)实现了世界的第一次"全球化",它持续了三到四个世纪,使西方世界各地区之间得以进行广泛的交流。直到蛮族开始不断入侵帝国,这一"全球化"局面才逐渐崩溃。

《在延安:陈嘉庚1940年国内抗战考察纪实》,陈满意著,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6年1月出版。

一部照见人心、照耀历史的力作

胡忠伟

陈嘉庚这个名字,已深深地刻印在中国人的心里。

《在延安:陈嘉庚1940年国内抗战考察纪实》以非常翔实的史料,还原了1940年陈嘉庚和南侨慰劳团回国慰劳考察这一重大历史事件。

当我翻开这本厚重的纪实作品,陈嘉庚先生用一颗爱国心铺筑的信念之路、光明之路,再次清晰地展现在面前,他以民族大义为重、以国家利益为重的爱国情怀,推动华侨团结、投身救亡斗争的凛然正气,折服了大家。

1937年,抗战爆发。次年,南洋华侨抗日救国统一组织"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在新加坡成立,陈嘉庚任主席,积极以财力、物力、人力支援祖国抗战。

时间进入1940年,抗战正处于最艰苦的战略相持阶段。中国半壁江山已沦为敌手,国难当头,人民面临沦为亡国奴的关键时刻,作为当时华侨界领袖的陈嘉庚决定组织并亲率"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考察团"回国考察。考察团历时9个月,足迹遍布15个省份,行程10万余里。1940年5月31日至6月8日,陈嘉庚在延安度过了他毕生难忘的9天。在这期间,他广泛接触各界人士,悉心进行考察研究,拜会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并与财政、公安、司法各界人士多次深入交流;参观女子大学、抗大第三分校、延安新市场及安塞铁工厂、印刷厂;广泛接触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的校友及归侨男女青年。通过这些活动与接触,他眼界大开,展现在他面前的延安,原来是这样一个充满生机的神奇新世界。在延安的见闻令他耳目一新,精神为之振奋,共产党领导人用民主、平等、清廉和简朴的作风,折服了他。这一次延安之行,他发现了在黑暗的中国还有一个光明的地方,在这里,他看到了中国的救星。他原本近乎绝望的内心犹如拨云见日、昏镜重明。访问延安,是陈嘉庚政治观点发生根本转折的契机。在此之前,他对共产党不甚了解。然而,他为人正直、尊重事实,仅9天的延安之行,他的认识发生了重大变化,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由怀疑转为同情和信任。

离开延安后,12月14日,缅甸仰光华侨在九文台华侨中学举行盛大欢迎会,陈嘉庚在会上作了长达三小时的报告。这是陈嘉庚出国后,首次向海外侨胞作详细的报告。他详述了回国访问经过、最近抗战形势及必胜的道理,勉励华侨"更加努力,多寄家用及义捐"。他以自己的亲见亲闻,淋漓尽致地道出了国民党政府的贪污腐败、党政官员之间的争权夺利、派系倾轧等情况,揭露了国民党军队未战先逃,却在大后方调集重兵包围陕北、积极准备内战的真相。同时,他也介绍了在陕北的见闻,军民一家、吏治清廉、共御外侮。他以极乐观的语气向与会的华侨提出:"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在返回南洋后,面对身边亲人和华侨子弟,陈嘉庚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他说:"去年新加坡各社团联合欢迎我,我的演讲措辞是相当悲观的。我曾说,中国要转弱为强,必须再等半个世纪才有希望。经过这次回国实地考察,才知道我的话说错了,原来拯救中国的人不但早已诞生,并且已经在那里做出许多大事了。假如有更多的人像他们那样刻苦耐劳、埋头苦干,我们中国一定可以成为世界上第一强国。"可以说,这次回国考察也是陈嘉庚人生重要的转折点,从此开启了他与中国共产党同心同行、肝胆相照的崭新人生。

"中国的希望在延安",他走一路宣传一路。一个无党派爱国老人的公道话,使在国民党严密控制下的大后方人民和华侨华人耳目一新,受到极大鼓舞。在他的引领下,大量海外华侨华人坚定地站在了中国共产党一边,以自己的坚定行动,为支援抗战、反对内战、建设新中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本书作者以记者的职业敏感和精细,从大量的报刊新闻、信札、电报、演讲稿、图片、人物照片等史料中,引证大量的信史,层层爬梳,剥茧抽丝,以新闻视角叙写历史,诠释了"历史是昨天的新闻,新闻是明天的历史"的史学观。全书以1940年国内政局的变化、国际战事的发展、南侨回国慰劳团的行程和陈嘉庚思想的转变等四条线索,将从故纸堆里抽绎出来的陈嘉庚回国考察的历程和细节一一串联起来,用"组织慰劳团回国、陈嘉庚和慰劳团到达重庆、延安之行、畅谈西北观感、西南各省考察、十八年后回到故乡、滇缅路视察、中国的希望在延安"等八个章节,以全景纪实的方法,生动全面地再现了以陈嘉庚为首的爱国华侨的正义之举和爱国行动。作者以简洁不繁的语言和行云流水般的书写,表达了对广大爱国华侨的敬意,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团结一心、同仇敌忾、共襄建国大业的由衷佩服,是一部照见人心、照耀历史的纪实力作,是一部不可多得的爱国主义教育教材。